

可可西里无人区腹地，一场风雪刚刚过去，一群藏羚羊在山谷中缓缓行进，其中很多母羊带着刚刚产下的小羊，它们互相照应着，像是排着整齐的队伍。看到这一幕的那一瞬间，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摄于可可西里。





大多数野生动物争夺交配权无疑就是一种“决斗”，这种优胜劣汰的过程对种群优化起着积极作用。藏羚羊与其他偶蹄目物种一样，尽管食草看似温顺，但在争夺交配权时会表现出“决绝”的斗志。每年冬季在可可西里都会“上演”无数起雄性藏羚羊间的搏斗。摄于可可西里。

从顾莹的这组作品看，她已然超越了一般的动物摄影，其视角聚焦在了地球环境与生物。在人类以地球主人自居、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的当下，“角落”既是隐喻，也是现实。伴随越来越“强大”的人类，动物越来越成为这个星球上“角落里的配角”。



顾莹，野生生物摄影师，青海可可西里世界自然遗产唯一特邀摄影师。前中国滑翔伞国家队队员，四次全国滑翔伞女子冠军，第一位创造中国女子滑翔伞点对点直线越野百公里纪录者。从鸟类摄影开始拍摄世界野生生物，足迹踏遍全球七大洲。获得 2016 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最高奖优秀摄影师评审委员会大奖；2016 中华文化人物；2017 伟兰·史密斯·莱斯年度大奖。

恢复社区活力，共建生态中国

文 / 刘蕴华

自然保护区的困境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为保护这些宝贵的自然遗产，我国目前为止已经建成了 2700 多个各种级别的自然保护区，为珍稀濒危动植物及其生境保护做出了很大努力。但与不断增长的保护需求相比，我国目前的自然保护区系统仍显不足，首先是系统不能覆盖国土内所有需要保护的区域，其次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有效性也不够理想。

针对如何加强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有效发挥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协调保护区和周边社区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关系等问题，当今我国的自然保护区有几种代表性做法：

“纯自然”的保护模式。主张自然保护无人区，认为社区应该搬离野生动物栖息地和其它有重要生态保护价值的区域，保护区域由政府接管或由国内外有经验的环保组织甚至个人承包和管理。这一保护模式存在公平公正和保护有效性的问题。

协议保护模式。由环保组织及相关单位牵头，与保护区内部和周边的社区签订协议并提供一定的项目经费支持，社区根据协议内容参与保护工作。但这一保护模式也存在工作持续性、社区的权利和保护家园的自豪感被剥夺的问题。

旅游公司承包模式。有些保护区为解决资金来源，将自然保护区

承包给外来公司和个人开发旅游，社区群众参与的方式是为旅游公司负责保洁，进行餐饮服务等。在这样的模式中，由于外来承包者更看重短期利益，缺乏当地生态环境知识和长远保护的动机，往往竭泽而渔，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破坏。

让社区成为自然保护的责权主体

在多年的社区工作实践中，我们认识到自然保护区内部和周边社区在自然保护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应重新评估。我们主张社区成为自然保护的责权主体，国家应扶助社区恢复活力，使祖祖辈辈生活其中的群众成为当地自然保护的主体而不是被迫搬迁、被迫接受有限补偿、或为外来公司打杂糊口的对象。

中国的乡村社区有着深厚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这些传统为中国目前保留下来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社区话语权的缺失，社区群众往往被边缘化、被误解，被看成是保护区生态环境的破坏者。事实上保护区环境最主要的威胁者并非来自社区而是来自外界。社区固然在建房、取暖等方面需要用材，但他们绝不是当地生态环境退化的主因，对当地生态破坏最大的是大面积森林砍伐、修路、建坝、挖矿等外界行为，当地群众对此是非常反对的。

目前虽然不少原住民的家园被规划成了自然保护区，但由于核心区、缓冲区和试验区的划分，很多

老百姓仍然能够生活在保护区周边，在不破坏自然的情况下利用保护区内的部分自然资源维持生计。但随着政策力度的加强，可以预见社区生计必将受到进一步影响，有些社区甚至会被迫搬迁。

我们主张社区与保护区携手，共同完成保护任务，让社区充分发挥作用。其实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与周边是无法割裂的，保护区内部的动物、鸟类会到周边的农田觅食、蜜蜂会飞到保护区外采蜜，如果单纯按照保护区划定的生硬的界限严格保护，而不关注保护区周边的乡村生态建设，推动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希望保护区内和周边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不受化学农业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同时，保护区周边的社区也有能力成为自然保护的主要力量。与欧美国家情况不同，中国自然保护区内部和周边历史上就有大量社区群众祖祖辈辈居住生活于此，是当地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传统的智慧与自然和谐相处，将他们搬迁出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有失公平。

社区的生活固然需依赖当地包括保护区在内的自然资源，但社区中也传承着传统文化中的保护智慧和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方法，有着维持可持续生计、保护好自己故土家园的意识和觉悟。所以要真正实现保护区生态保护的目标，更需要以社区为本。社区群众有着比外来人

员更强的保护意愿、实践技能和经验，不应被看成是没有觉悟的低能群体和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者。社区群众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提高，完全可成为当地自然保护的核心力量！

生态乡村建设的学习和行动

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被经济发展、消费欲望所绑架，造成窘迫严峻的环境困境之时，我们更需要从东方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构建新的生态伦理价值观。需要记得上善若水、道法自然，需要学习驱除内心的贪痴嗔等种种欲望，需要遵循儒家的指引去“格物、致知”继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而达成个体内心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

我们提倡生态乡村建设，即是通过相关行动实现个人、集体、社会三个层面的提升，开展文化传统的恢复、自然资源的保护等工作，达成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调动社区群众的保护主体作用，社区与保护区共同携手，完成任重道远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任务。

首先，谈谈个人、集体、社会三个层面的学习和推动工作。在个人层面，社区群众通过学习和行动中获取的有关自然、社会、经济和治理方面的知识，提升自身可持续生产生活的技能（传统的农耕技能，保护山林与水资源的技术等），增强建设可持续未来的态度和价值观，而我们东方传统智慧可为之提供丰富的养分。在集体层面，可以建立相关机制，汇集社区集体智慧、形成集体声

音并采取集体行动。如可采取创建社区学习中心、民间自然保护区等方式，其组织形式可以参考乡村传统、本土的管理模式，以形成与村委会、社区群众的良好互动。其实现在很多外来的现代管理方法破坏了乡村的宁静和原本运行机制。而在社会层面，需要调动广泛的力量推动社会学习，建立伙伴关系网络和公共学习平台，构建大家共同认可的生态伦理价值框架。

在具体的生态乡村建设行动方面，我们可以开展的工作包括传统文化恢复，如儒释道的传统、本土的宗教文明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工作，包括本土森林、河流、土地的保护等；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计提升；社区文化环境的改善，如提供教育和健康培训等等。更为具体的工作可包括：

发展生态农业：恢复和传承中国的农耕文明——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农耕传统，可是随着现代化学农业的推广，中国现在却要靠进口粮食才能养活自己。土地是立国之本，要保护生态环境，就需要支持乡村开展生态农业，保护土壤。先不说人，农田被污染了，野生动物也难逃厄运，因为蜜蜂要采花，鸟儿要觅食，老熊也会到田间里偷包谷。

开展生态旅游：为寻找田园梦的游客们提供亲近自然和体验乡村生活的机会，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为社区提供培训开展生态旅游，将生态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分享给游客。同时也可因此改善乡村的卫生间、厨房、取暖等设施，增加舒适度和乡村的田园感。

进行生态教育：其实乡村社区也可以成为传道、授业、释惑的地方。社区是学校和课堂，社区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是教材，而社区群众则是老师和同学。把社区建设

成来访客人和学生学习乡土知识、生活技能和传统生态保护文化的基地。只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相信社区就能发挥好文化传承、自然保护和教育大众的作用。

此外，还有大量可以开展的社区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工作，如建设社区中心、发展太阳能、沼气等清洁能源机制、进行各类培训和交流活动等。

总之，社区群众应当成为当今我国自然保护和生态中国建设的责权主体，自然保护离开了社区群众真正意义上的参与便不能成功。如果能够给予社区足够的支持，使其有机会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他们便可成为我国自然保护的中坚力量！相信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社区学习与行动，不仅能够提高自然保护的参与度和有效性，更能为中国和世界的保护工作提供重要的借鉴和灵感。☞



刘蕴华

香格里拉可持续社区学会会长，曾任WWF中国教育项目负责人。长期从事生态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的工作。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需要大力发挥社区保护地的作用

文 / 李晟之

认识社区保护地

社区保护地与自然保护区一样，都属于自然保护地的范畴。相比而言，自然保护区是受到最严格保护的自然资源保护地，社区保护地则同时兼顾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中国最早的社区保护地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西汉刘歆编著的《山海经》记载着战国时期不同方位的300余座山，这些山中据说很多都有山神，山神的喜怒影响着当地山民们的庄稼收成、牲畜状况和生命财产安全，因此被信奉而不能随意进入山中，山民们也自发地约束自己与他人遵守这些规定。全球的社区保护地的保护机制基本相同，当地老百姓基于生产或生活原因而自发和共同地对一个生态区域开展保护。

相比于漫长的实践，社区保护地的概念最早于2004年在曼谷的世界保护大会才被首次提出，2010年在第10次缔约方大会（名古屋）的建议报告中做了关于原住民/社区保护地认可的特别建议。

截止2015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在政府注册的社区保护地，也被称为自然保护区小区有5万个左右。更多的社区保护地是老百姓自发管理但没有与外界合作，由于没有注册所以数量无法统计。尤其是在一些西部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几乎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社区保护地。

一个社区保护地，通常都具有四个属性：首先是管理属性。社区保护地在管理中依据一定制度，如习惯法、乡规民约或家规等，一方面面对社区内农牧民的自然资源利用

进行约束（管理），即内控性的自我约束；另一方面也排斥或管理外来资源使用者；其次是空间属性。社区保护地通常具有明确的四至界限，但很多时候它的边界又是“非正式的”和“动态的”。所谓非正式的，是指社区保护地的农牧民从历史上某一时点看对于自然资源管理的权力具有合理性，但不一定都是受到当前法律的认可或保护，某些情况下甚至与国家的和周边社区的土地权属相冲突。所谓动态的，是指社区保护地的大小和社区的管理能力是相一致的，同一个社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管理能力不同，所管理的社区保护地大小也不同，与相邻社区或管理单元的社区保护地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况；第三是多目标属性。农牧民传统上对社区保护地内的资源利用通常具有多目标的，不会单一、片面地去利用社区保护地的某一种或几种资源造成过度利用，强调综合利用并发挥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但同时也很少有绝对保护不开发利用；第四是文化属性。社区保护地通常依托于当地的生态文化和传统生态知识，具体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宗教、禁忌、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等。

社区保护地的作用

在微观区域内平衡好保护与发展矛盾：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是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亟待破解的突出问题。纵观过去60年来中国生态保护历史，主要的策略还是在在一个较大的地理范围进行区划，

规定其中一些区域严格保护禁止自然资源利用，另外一些区域则进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但从成效来看，需要严格保护的区域，如自然保护区，大部分核心区都并没有能做到法律和规划所要求的完全禁止自然资源利用。

社区保护地通常能针对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的矛盾形成可持续的平衡点，并根据自然资源状况动态地进行调整。社区中的农牧民长期在生态系统中生产生活，与自然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如果没有外来干预，社区既不会封闭式地开展保护，也不会掠夺性地利用某一种或几种自然资源，而是较为完整地对生态系统的各项自然资源加以多重利用，在社区内部也形成不同利益农户之间相互制约和平衡。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贯彻群众路线：统筹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矛盾，不能仅仅依靠从上到下的行政力量约束和只对上级负责的环保体制，需要以人民为主体，践行群众路线。不把长期生产生活在自然保护区内或周边的农牧民纳入到生态系统管理中，成为保护的主要力量，自然保护区管理必然是高成本、低效率的。

社区保护地对保护与发展的平衡是以农牧民为主体。社区保护地的管理基于农牧民的利益和自愿，社区保护地管理决策以农牧民集体讨论决定，执行和成效监测也是集体参与，是低成本和可持续的。

农牧民如何与外界平等互动：生态产品具有公益性质，生态产品

生产和提供不仅要依靠在地的农牧民，还需要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在这个环境治理体系中，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城镇居民的外界，如何与在生态区域内长期生产生活的农牧民平等合作、良性互动是一个困扰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领域多年的老问题。

目前由国家主导的大型生态工程项目如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管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湿地保护工程等，都采用政府直接与农户签订协议的模式。这种模式其实质是让农户以家庭为单位承担生态系统的管护责任，其优点是操作简便，但缺点是由于单个家庭能够承担的责任太小，无法提出真正具有实践意义的保护要求和责任。相应地，国家主导的这些生态补偿项目只能以机会成本作为给农牧民的补偿标准，而不是按照实际工作需要和管护成效来进行补偿，制约了进一步提高标准的空间，也限制了关键生态区域的农户增收途径。

社区保护地是外界与社区互动的良好的平台。社区保护地往往凝聚了社区内部对于如何保护与利用自然资源的共识，并且自我组织开展相应的活动。社区内部的共识和协调使外界，包括政府和社会公益力量以及商业企业能够有效率地与社区开展合作，实现多赢的目标。外界支持社区保护地建设的各种资源，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进入社区，鼓励社区内成员开展民主协商来分配和利用资源，也为完善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社区保护地建设的重要环节

完善乡村治理，形成农民参与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集体行动。社区保护地建设需要社区成员的集体行

动，在全体或大多数成员自愿的基础上协调一致地制定目标、管理制度和开展活动，每个农户都可能需要投入劳动力甚至一些经济资源。然而，农民在集体中往往同时具有自利和道义两种秉性，搭便车和公益心俱存。

社区保护地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是让社区成员围绕自然资源管理多一些道义，少一些自利。信息公开、协商民主、平等磋商、建立能激励和约束社区精英的制度，既是社区保护地建设的重要工作，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社区保护地建设必须依托于良好的乡村治理，同时也可以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二者互为因果和支撑。

减少三类风险影响，切实助力农户经济转型。如何能增加收入、把生活过得更好是每个农户都在思考 and 探索的目标，每个家庭事实上也在不断地寻找机会实现家庭经济从“多样化+自给自足”到“专业化+规模化”转型。在农户尝试家庭经济转型过程中，常常面临自然灾害、市场波动和政策变化三种类型的风险，甚至三种类型风险相互叠加，导致农户在家庭经济转型探索中失败，浪费资源、欠上债务、丧失信心。转型失败后，有的家庭又积蓄力量重新等待转型的时机，有的却从此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融入国家生态战略，获取外界的帮助与支持。社区保护地建设以社区为主体，但应该融入到国家生态战略，成为实施国家生态战略的抓手和重要力量。社区保护地建设如果能够与国家生态战略接轨，则不仅可以得到国家的资金、技术扶助，当面临来自外界不法侵害时，更容易得到保护部门的支持和法律援助；融入国家生态战略后，也更可能得到来自企业、社会组织和社

会公众的支持。

国家生态战略在实施过程中由不同部门以部门立法、各种规划和项目来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往往较多地体现了本部门的行业特点、技术规范，但最终都与“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一致。寻求社区保护地建设与国家生态战略融合，首先应该深刻领会国家最顶层设计（如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精神，树立在实施国家生态战略中以人民为主体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其次应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包容性地审视并破除把社区保护地融入各项生态保护与修复专业性规划和国家工程项目存在的政策和技术障碍；第三，应加强对社区的环境意识教育和政策宣讲，让农牧民了解国家的政策宗旨、内容和可能的参与途径。



李晟之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资源与环境中心秘书长，区域经济学博士，四川省政协人口与资源环境委员会特邀成员，社区保护地中国专家组召集人。



SGP

The GEF Small Grants Programme

社区保护地 生态保护的显微荒野

策划 / 《中国周刊》编辑部
支持机构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实施的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UNDP GEF SGP）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支持原住民和社区保护以及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在地行动。目前已经在 125 个国家支持了数以千计的社区保护地。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中国项目自 2009 年成立以来，共支持了 21 个社区保护地，其中有 9 个已经在原住民和社会保护地注册系统（ICCA Registry）成功注册。这些社区保护地都处在中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和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如云南、广西、贵州、青海、甘肃等。它们有的是自然圣境，有的与政府的保护区重叠但实际上由社区保护和管理，有的在原有的基础上由民间组织扶持推动，有的已经获得政府的备案和挂牌认可。无论是哪一种形式，这些社区保护地都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保护着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地区。



Empowered lives.
Resilient nations.



www.theGEF.org

The ICCA
Consortium

社区保护地 地球上最古老的保护地模式

文 / 刘怡

2014年6月第一次到云南迪庆州的藏族村落巴珠，惊异于村里极高的森林植被覆盖率和清亮透明的巴珠河；清晨是在各种鸟鸣中醒来，据当地调查，巴珠的鸟类有200多种。陪同我们访问的当地人呷土指着远处的山峰说：“我们村里有八座神山，上面住着山神，大家只能在神山上祭拜、转经祈福，不能大声喧哗、不能砍柴、扒松毛、更不能砍树，即使是已经倒了的树也只能留在神山上腐烂。每年6月到10月是雨季，这时候是山神吸取养分的时期，所有的山林都禁止砍树，连人们上山都不准带斧头。”巴珠村的村民就是靠着这种祖祖辈辈传下的老规矩世代守护着这8万多亩的森林。因为森林保护得好，水源就涵养得好，即使是在2010年云南全省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巴珠也没有缺过水，还成了云南省林业厅表彰的典型。

像巴珠这样，由社区基于传统习俗或习惯法自愿管理的社区保护地遍布全球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和文化形态，从喜马拉雅的神山圣湖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保护地，从印度的神兽/神鸟栖息地到伊朗游牧民的迁徙路线，从塞内加尔的牧民保留地到西班牙的社区森林，从津巴布韦的神圣森林到日本冲绳的里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ICCA）定义为：“包括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通过习惯

法或其它有效途径，由原住民和当地社区自愿保护的自然的或人工改造的生态系统。”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社区保护地具有三个共同的特征：第一、社区保护地涉及到某种类型的“公地”，社区同一个生态系统或周边的自然资源在文化或生计上紧密相连；第二、社区保护地具备有效的制度安排（习惯、规范、当地文化、非成文法），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下，社区有决策的能力和权力；第三、社区的决策使得社区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文化价值得到了有效保护。

世界各地的许多原住民和社区都与他们周遭的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紧密相连，他们与自然的关系远比划出一块土地设立保护区要复杂得多，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生产、生活、传统知识、精神需求、文化习俗都与这些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交织在一起。原住民和社区可能出于多种目的而保护和管理他们的保护地，他们可能为了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清洁的水源，防止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而保护自然；他们也可能为了精神需求或宗教信仰、身份认同而保护，比如藏族的神山圣湖、傣族的龙山、彝族的神树林以及其它民族的风水林等；他们还可能为了抵御外界的影响和威胁、保持自己的政治、文化、经济的自治而保护，比如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等地的原住民、部落保护地。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管理目标同

政府管理的保护区十分相似，可能是严格保护类的，比如自然圣境类的社区保护地；也可能是为了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而进行保护，比如马拉西亚的社区可持续渔业管理区、蒙古国的部落草场、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社区森林等；还可能为了修复生态环境而进行保护。较多的情况是，同一个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往往有多个管理目标同时存在，而不仅仅是某个单一的管理目标。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在平衡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是全球无数原住民和社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确保原住民和社区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药品、能源、水、饲料、收入等，同时也是原住民和社区的精神家园，是他们身份认同、文化自豪和集体记忆的基础。很多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保护着关键生态系统和受威胁的物种，并维持基本的生态系统功能，为动物和基因的迁移提供廊道和联接。由于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是基于传统、文化、规则等习惯法来保护的，它确保了社区作为治理的主体，以及社区对他们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权力，是实现社会公平、多元共治的有效途径。

在过去20年中，ICCA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IUCN按照保护区管理目标的不同，将保护区分类为：Ia 严格自然保护区，Ib 荒野区，II 国

家公园，III 自然纪念物，IV 生境/物种管理区，V 陆地/海洋保护景观和VI 资源管理保护区。同时，IUCN根据谁拥有保护区的决策和管理权以及谁对保护区负责，将保护区分为四种治理类型：A 政府治理（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对保护区拥有责任、权力、义务，并决定保护区的管理目标，制定和执行保护区管理计划，同时也拥有保护区的土地、水和其它自然资源。）B 共同治理（多个政府或非政府部门共同承担管理的权力和责任，例如集体管理，决策的权力和责任由一个机构承担，但根据法律或政策的规定，这个机构在决策时必须通知或咨询其他利益相关方。又如联合管理，是由不同的人组成具有决策权力和责任的管理主体。再如跨界保护区，至少涉及两个或多个政府和它的当地机构作为决策主体。）C 私人治理（包括由个人、合作社、民间组织、公司所控制和拥有的保护区。管理保护区的权力取决于土地所有者，由他来决定保护区的管理目标、制定和执行管理计划、负责决策和遵循相关法律规定。）D 原住民和社区治理（原住民或/和社区通过不同形式的习惯法或成文法，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和规则，对保护地行使管理的权力和责任。）可见，ICCA是跟政府治理的保护区、多个部门或主体联合治理的保护区以及私人设立的保护区平行的一种保护区治理形式，它可以是IUCN保护区管理分类的6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

2003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第5届世界保护区大会（World Park Conference）上，保护专家们第一次系统地使用了“保护地治理”的概念，并指出原住民和当地社区是保护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对保护地的治理作用应该得到充分认可，原住民的权利实际上会增加保护的成果而不是减

少。德班会议后不久，2004年在吉隆坡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缔约方大会批准了保护区工作计划（PoWPA）。这个工作计划正式呼吁缔约方支持创新型的保护区治理类型，包括ICCA，通过国家立法和其它有效途径对ICCA进行认可；并要求缔约方注意治理的类型和质量、保护中的公平、以及原住民的权利。2004年在曼谷召开的第3届世界保护大会（WCC3）和2008年在巴塞罗那召开的第4届世界保护大会（WCC4）都同样确认和强调了对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治理类型的认可。

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上，生物多样性公约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SBSTTA）在其建议报告中做了关于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认可的特别建议，指出对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认可机制应该尊重长期以来维持原住民/社区保护地的习惯法管理体系。”习惯法作为一类社会规范，不仅中国有，而且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它虽然不是成文法，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习惯性。比如巴珠村对于神山的保护规则就是习惯法。

就在第10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制定了遏制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路线图和需要达成的20项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原住民和社区扮演着重要角色，全球范围内很多自然资源实际处于他们的管理和维护之下，他们的传统知识、风俗习惯中包含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长期经验和智慧。比如，“目标1：到2020年，人们认识到生物

多样性的价值以及他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能够采取哪些措施。”原住民和社区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理解和认识往往包含在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中，他们的保护经验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实践为世界各族人民和现代保护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有效途径。²

“目标5：到2020年，使所有自然生境、包括森林的丧失速度至少减少一半，并在可行情况下降低到接近零，同时大幅度减少退化和破碎情况。”原住民和社区在抵御由开矿、森林砍伐、开发建设等造成的栖息地破坏和破碎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目标7：到2020年，农业、水产养殖及林业覆盖的区域实现可持续管理，确保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ICCA往往包括农业、渔业、林业等生产性景观，对维持农业生物多样性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这些地区正面临着企业、政府的大规模土地兼并用于单一的经济作物种植或是其它开发项目。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长久维持将有利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

“目标11：到2020年，至少有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尤其是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区域，通过有效而公平管理的、生态上有代表性和相连性好的保护区系统和其他基于保护区的有效保护措施而得到保护，并被纳入更广泛的土地景观和海洋景观。”据25个国家已有的数据预测，社区保护地覆盖的面积可能同政府指定或管理的保护区面积一样大，甚至超过政府管理的保护区面积。¹仅就森林面积而言，全球范围内由社区

保护的森林大约是 5 亿公顷，这至少跟政府管理的森林类型保护区同样重要。² 如果各国政府在充分尊重原住民和社区意愿的前提下，以恰当的方式认可和支持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将对于实现目标 11 作出重大贡献。

“目标 13：到 2020 年，保持了栽培植物和养殖和驯养动物及野生亲缘物种，包括其他社会经济以及文化上宝贵的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同时制定并执行了减少基因损失和保护其遗传多样性的战略。”许多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处于农业、水产养殖及林业覆盖的区域，是维持驯养动物和栽培植物，以及它们与野生亲缘物种之间联系的重要场所。典型的例子是，青藏高原牧民们的轮牧草场是饲养家牦牛的场所，但往往也是野牦牛出没的地方。贵州黔东南偏僻的侗族村庄至今还种植着一种最古老的稻种——红色糙米，这个稻种据说已有 7000 年的历史，虽然产量每亩只有 300 斤，但当地人仍然坚持用最古老的传统耕作方式种植，使得这一稻种至今保存下来。

“目标 14：到 2020 年，带来重要的服务，包括同水相关的服务以及有助于健康、生计和福祉的生态系统得到了恢复和保障，同时顾及了妇女、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贫穷和脆弱群体的需要。”很多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这里能为社区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如清洁干净的水源、适宜的气候、生产生活的原料等等。ICCA 的管理目标很多都包括了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 ICCA 是基于社区传统的风俗、文化、规则等习惯法来治理的，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能充分地采纳地方社区、妇女、原住民和脆弱群体的意见。对于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认可是实现目标 14

的基础。

“目标 18：到 2020 年，土著和地方社区的共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及其对于生物资源的习惯性利用，根据国家立法和相关国际义务得到了尊重，并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各国相关层次上的有效参与下，充分地纳入和反映在《公约》的执行工作中。”ICCA 的存在就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传统知识和在地实践的集中体现。例如笔者 2017 年 4 月曾访问过马来西亚沙巴岛的 Tagal，这是一种社区对河流管理的传统方式，社区会根据当地情况设定禁渔区和禁渔期，保证渔业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传统在很多地方已经不复存在。2002 年开始，沙巴渔业局开始跟社区建立伙伴关系，帮助社区恢复这种传统的河流资源管理方式，并在沙巴广泛推广，目前这样的 Tagal 在沙巴有 500 多个。是政府认可、鼓励传统知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中的典型案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也是落实和实现 2011 ~ 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认识到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重要作用并对它进行认可。其中一个机制就是全球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注册系统（ICCA Registry）。这个注册系统是由位于英国剑桥的联合国环境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WCMC）管理的，这个中心还同时管理保护区世界数

据库（WDPA），监测全球范围内其它类型的保护区包括政府管理的保护区。ICCA Registry 包括数据库和案例研究的网站两部分，保存着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相关信息。数据库和案例为原住民和社区提供了一个分享他们保护的经验和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的机会，也给社会各界认识和理解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提供了一个平台。为了充分尊重原住民和社区的意愿，所有提交注册的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也必须同时提交《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书》（FPIC:Free,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说明注册是全体社区集体同意的决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实施的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UNDP GEF SGP），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支持原住民和社区保护以及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在地行动。目前已经在 125 个国家支持了数以千计个社区保护地。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GEF SGP）中国项目自 2009 年成立以来共支持了 21 个社区保护地，其中有 9 个已经在 ICCA Registry 成功注册。这些社区保护地都处在中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和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如云南、广西、贵州、青海、甘肃等。它们有的是自然圣境，有的与政府的保护区重叠但实际上由社区保护和管理，有的在原有的基础上由民间组织扶持推动，有的已经获得政府的备案和挂牌认可，无论是哪一种形式，这些社区保护地都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保护着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地区。

世界各国对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认可情况并不一样，有些国家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完全认可和支持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有些国家并不认可，

有些国家认识到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作用，正在探索认可的方式，而有些国家对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认可的方式却是破坏性的。在澳大利亚，ICCA 被认可为“土著保护地”。1992 年，澳政府承诺要建立一个全面、充足、能代表澳大利亚所有陆地生物区的保护区系统——国家保护区体系。由于有些生物区只在原住民的领地内存在，政府通过一个与原住民组织合作的“土著保护地”项目为原住民群体提供资金和其它支持，使原住民能够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立保护区。这种“土著保护地”是由原住民自己规划、管理、自愿宣布成立的。政府的项目将“土著保护地”纳入国家的保护区体系，是对“土著保护地”的正式认可，但“土著保护地”并不是政府管理的保护区。政府也认识到，很多政府管理的保护区建立在原住民的传统领地但并未获得原住民的同意，“土著保护地”项目也提供资金，帮助原住民加强参与这些保护区管理的协商权力。澳大利亚的陆地保护区面积约为 1.06 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 14%，其中 3650 万公顷是土著保护地，相当于澳大利亚保护区总面积的 34 %。³ 在柬埔寨，国家在《保护区法》中明确规定认可社区保护地，并对其建立、管理、评估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柬埔寨的环境部有权将可持续利用区划分给居住在保护区内及周边的社区作为社区保护地。社区保护地所在社区需要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约；如果社区违反协约的条款和管理计划，环境部有权撤销同社区保护地的协约。社区提出自然资源管理规划，并获得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批准，规划应每 3 年评估一次，或在必要

时进行提前评估。⁴ 在哥伦比亚，原住民对土地、自然资源、自治享有集体权，他们的文化得到完全尊重。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的总面积 3400 万公顷，占到哥伦比亚国土面积的 30% 和全国森林面积的 80%，其中非裔哥伦比亚社区拥有 500 万公顷土地的集体产权，但原住民和社区没有地下资源的权利。社区保护地在哥伦比亚并不能像政府管理的保护区一样得到认可，除非社区同意接受和政府共管的治理类型。原住民和社区正面临着是接受共管模式，还是在采矿特许权面前毫无办法的艰难抉择。⁵ 在菲律宾，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原住民可以宣布对祖先世居地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这种权利由国家综合保护区体系（NIPAS）颁发的“祖先世居地证书”加以确认。这个综合保护区体系同时认可原住民的自治和自主权，包括尊重他们传统的自然资源的管理实践，尊重他们原有的精神、宗教传统、风俗和仪式，并赋予他们维持、保护和进入传统宗教、文化场所的权利。⁶

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恐怕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保护地模式，同时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地社会、历史的演变而发生着持续的变化，有的消失了，有的幸存下来，有的又重新出现。尽管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地都具有自愿、自组织、保护珍贵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性质，但是，同每一个社区保护地相关的信仰、实践方式、治理机制都千差万别。经历了时间洗礼和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社区保护地，有的可能已经被政府的保护区所替代，但自然资源的实际管理权仍由社区掌握，有的可能

在强大的外力干涉下已经失去了社区治理的能力，有的将传统知识和现代科学相结合、进行着新的保护实践，有的可能在现代化的巨大压力下仍然牢牢抓住自己的文化、坚守着古老的传统，有的可能正在同外来的开发力量苦苦抗争。

在现代化大潮裹挟下的社区保护地正面临着诸多威胁：资源开发、土地侵占、被强行并入保护区、气候变化、本土知识破坏、文化传承断裂、内部治理机制丧失等等。除了社区需要加强凝聚力及代际间的传承外，政府、民间组织、国际社会都应该加强对社区保护地的适当认可和支持，在充分尊重社区的前提下提供必要的帮助，让这种最古老的保护地在地球上焕发长久的青春。确保原住民和社区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权利，能有效对抗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而且是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方法。☞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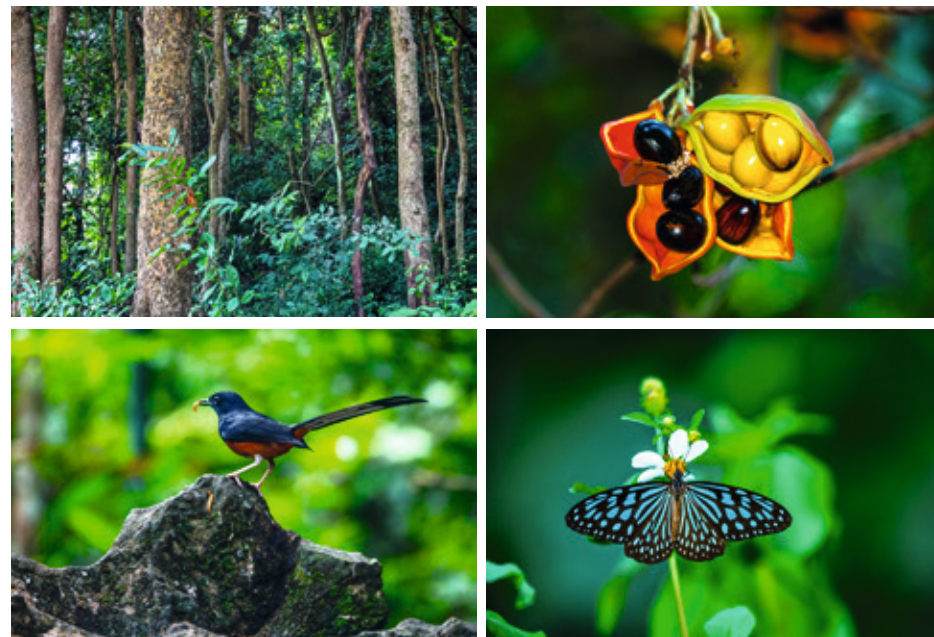
- [1] [2] ICCAs & Aichi Targets: the Contribu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s and Local Community to the Strategic Plan for Biodiversity 2011–2020.
- [3] 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national legislation, judgements, and institutions as they interrelate with territories and areas conserved by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report no.18 Australia.
- [4] Pprotected Area Law of Kingdom of Cambodia.
- [5] A glance of ICCAs and ICCA Consortium, PPT by Grazia Borrini–Feyerabend.
- [6] 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national legislation, judgements, and institutions as they interrelate with territories and areas conserved by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report no.16 The Philippines.



渠楠 白头叶猴的家园

文 / 叶卫东 摄影 / 程斌、梁霁鹏、Okranz、宋晴川、《中国周刊》记者 杨剑坤
支持机构 / 美境自然

渠楠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保存相对完整，紧邻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气候温暖，四季常绿，群山环抱，具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优势。



组图：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极度濒危、中国特有物种——白头叶猴全球种群的12%就生活在渠楠。除此之外渠楠还有二级保护动物猕猴，已观察到的四十几种鸟类等动植物。

2017年11月8日,《中国周刊》走进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山圩镇昆仑村渠楠社区保护地。

车子从南宁出发,大约两小时后,转上一条进入渠楠的简易红土路。路面坑洼不平,而且有弯道。路两边的青绿山峰夹峙出一片片谷地。陪同我们的渠楠屯长滕文超说,本地的山都带有一个“邕”字,是由壮语的“山”引伸而来。眼前的叫邕离山,更远些的是邕圆山。

渠楠地处低纬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暖,四季常绿,再加上群山环抱,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山峰险峻但不高,而且植被葱绿繁茂。这里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头叶猴,二级保护动物猕猴,还有已观察到的四十几种鸟类。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保存相对

完整,又紧邻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极度濒危、中国特有物种——白头叶猴全球种群的12%就生活在渠楠。

从2008年到2010年,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与广西环保厅、林业厅共同合作,用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尝试建立了14个自然保护小区。2014年,美境自然(全称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对这些社区进行回访,发现有一半小区在项目结束的情况下依然发挥作用。于是美境自然在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GEF SGP)及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支持下,同广西林业厅启动第二次合作,探索自然保护小区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渠楠是四个新建保护小区试点之一。2014年,经渠楠屯委、社区动员,村民代表大会投票、递



组图：保护区管理局及其下属的岜盆管理站联合美境自然，多次走访渠楠，了解渠楠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志愿巡护队，兼任了整个屯的安全防卫工作。

交申请，最终经扶绥县林业局批准成立了保护小区。期间及其后村里和美境自然一起开展了多次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生物资源本底调查。

渠楠是一个壮族自然村，有居民110户，总人口450人左右，经济来源主要依赖甘蔗、西瓜、柑橘、玉米等作物。全屯约有旱地3500亩，水田360多亩（原种水稻，后改种甘蔗、玉米等）。几乎家家有水牛和牛车，用来运输甘蔗和农作物。有一家养牛大户，还有两家专业养羊户。近几年甘蔗价格低迷，渠楠村民从甘蔗种植转向柑橘类水果种植。由于人均土地面积较多，渠楠外出务工者较少，农闲时节会有部分村民外出打短工。相比其他社区保护地而言，渠楠屯收入水平相对较好，90%以上的家庭都有楼房，富裕家庭还购置了小轿车。

渠楠保留着壮族的许多文化习俗，如传统的集体议事制度等。村里有神龙庙和土地庙，每逢春节及农历三月三等传统节日，村人都会前往祭拜，祈求风调雨顺、家人平安。农历十一月，屯里会举办丰收节，大家饮酒庆祝。现在仍有老人会唱壮族采茶歌，编竹筐，懂草药，知道如何猎取野生动物等。

渠楠社区保护地的峰丛谷地多被开垦成为农田，但石山上还保存有相对比较完整的

森林生态系统。据村民回忆，社区保护地内的森林曾在1958年被大面积砍伐，但有一些地方如神龙庙周围的林子却从未动过刀斧。屯里有三片祖传的风水林，林中古木沧桑，幽暗阴森，让人敬畏。土地庙和神龙庙位于两片风水林。在村人心目中，风水林的一草一木都不能损害。以往破坏风水林或对土地庙、神龙庙不敬，以致遭到报应的故事在村里一直流传。屯里要求承包山场的村民，将山脚部分植满树木，产权归属个人，但永久不得砍伐。这是“风水林”的扩延，客观上给白头叶猴提供了更多食材选择。

推动保护小区的建设和发展

渠楠社区保护地发展的完善，外部机构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张颖溢，美境自然创始人，北京大学环境与生态学学士和动物学博士。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和灵长类专家，她曾在广西崇左开展白头叶猴的野外研究和保护，在白头叶猴的行为和生态学方面取得开创性研究成果。

美境自然对于渠楠社区保护地项目的良性发展，一直发挥牵引引线式的作

用，在社区保护地多次开展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本底调查，为社区保护地的成立、日常管理，及开展自然教育活动奠定了较好基础。他们不仅是渠楠社区保护地的发起者，也是重要的支持者之一。他们对渠楠的支持主要在社区保护地的能力建设、提高社区自治、推动自然教育和生态农业、帮助对接外部资源和改善政策环境等方面。在自然教育基地建立过程中，他们为渠楠众筹了用于自然教育的球场灯光照明、投影仪、摄像机、望远镜、巡护服等一系列设施和设备，极大改善了自然教育的条件。渠楠成立社区保护地并开展自然教育之后，社区在社会资本、环境资本、人力资本、物资资本和资金资本等五方面都有提高，尤其社会资本的提高是最明显的。由于社区保护地得到政府认可，并且采用的是自筹、自建、自管理和自受益的方式，所以社区

明显得到赋权，社区的内部自我治理能力也明显提高。这不仅仅体现在社区内部集体决策、内部凝聚力、集体认同感、文化归属感、社区自豪感的增强，而且社区与村委、乡政府、县政府、保护区、NGO、企业以及来过社区访问的机构和个人都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社区内部也更加的团结，相互之间更加信任。社区内各群体的能力提高也是非常明显的。

政府支持社区自治 NGO 协助群众获益

2014年12月，渠楠社区保护地正式得到政府认可，在扶绥县林业局备案并挂牌为保护小区。渠楠社区保护地及可持续发展一直都得到了保护区、县镇政府、美境自然、UNDP GEF SGP等外部机构的大力支持。2015年6月，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协助渠楠争取到

了扶绥县政府的扶贫资金，帮助渠楠屯清理了村内的池塘，将原来流入池塘内的污水进行了管道处理，岸边道路进行了改善和绿化。池塘的清淤和环境整治，使得村庄的景观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且，由于这个池塘也是野生白头叶猴在旱季常来饮水的场所，因此水质的改善也有助于对白头叶猴的保护。2017年7月镇政府承诺帮助渠楠修建通往村外的3公里左右的乡村公路，改善渠楠的交通条件，也为开展自然教育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由于渠楠社区保护地良好的管理成效，2016年被广西林业厅列入重点支持的保护小区，得到5万元的扶持资金用于购买望远镜和巡护服等设备。

2014年7月至8月，保护区管理局及其下属的岜盆管理站联合美境自然，多次走访渠楠，了解渠楠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等各方





组图：为了重建城市儿童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和情感连接，美境自然让城市的孩子参与自然教育活动，走进保护小区，了解和接触白头叶猴。

面的情况，并与屯委、护林员和村民代表沟通，建议渠楠按照《广西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办法》向扶绥县林业局申请成立自然保护区。保护区还与扶绥县林业局进行了积极沟通，获得了县林业局大力支持。2014年9月至11月，渠楠屯委就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宜先征求了党群议事会十多位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在获一致同意后又在全村进行动员，挨家串户征求意见。11月9日，屯委召开大会，100多位村民代表参加会议，并对成立自然保护区事宜进行表决，获全票通过。渠楠村民建立社区保护地的目的，是为保护分布在渠楠屯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中分布的珍稀濒危动植物，

希望社区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世代传承下去，让渠楠发展得更好。

NGO 主要帮助和陪伴渠楠社区保护地提高自治和管理能力，帮助其争取外部的支持，协助政府做好监测和评估；深入了解社区的历史、治理架构、审美艺术、信仰崇拜、节日习俗等，协助社区找寻和建立合适的保护地管理模式，而不是把社区保护地当项目来做。作为外来者，NGO 在工作中，了解社区需求，协助社区形成共识。通过宣传、政策、市场、文化恢复等多重手段让社区从保护中获得多重效益，避免只靠金钱激励和动员社区群众。渠楠社区保护地建成自然教育基地并持续开展自然教育活动之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志愿巡护队“零破坏”的巡护目标

渠楠屯社区保护地和保护小区成立以后，屯委成立了由四人组成的自然保护区管理小组，其成员包括屯长1人，副屯长2人及昆仑村委文书1人。管理小组内部有明确的分工，内部也有决策机制。管理小组制定了保护小区的村规民约在社区内进行了公示，并在社区的成立仪式、社区会议等多种场合进行了宣传，集体议事时村民无异议。

同时，屯里建起一支由17位年轻人组成的志愿巡护队，其中巡护队长1人，直接向管理小组汇报工作。考虑到渠楠屯的实际需求，屯委还因地制宜让巡护队兼任了整个屯的安全防卫工作，提高了巡护队成员的积极性。村民们积极参与到保护小区的管理中，在日常农业生产中监督村规民约的执行，以及白头叶猴和栖息地的变化。如果见到外来人员擅自进入社区保护地范围内有违反村规民约的行为，村民会进行询问、劝阻并及时报巡护队处理。巡护队若处理不了，则会让兼职护林员进行处理。若已经达到违法的程度，会上报给邕益保护站来执法处理。一般在破坏还未造成之前，违规行为就能够得到劝阻和制止。

2017年初，巡护队确定了新一年的工作计划，以及对白头叶猴的保护行动计划，首次提出了社区保护地“零破坏”的巡护目标。

在严格的巡护管理下，农田或桉树林侵蚀白头叶猴栖息地的现象，近期再没有发生。目前主要的威胁还是外来人员及个别村民上山捕鸟、放置铁夹等捕捉野生动物，以及偷盗观赏性树木如金花茶和紫薇等。巡护队员还发现外来人员会利用阴雨天以及村里大型节日村民不在田间劳作时，

乘虚而入进入社区保护地。例如有外来人员因为想取马蜂窝而砍了土地庙周边的几棵树。为吸取教训，巡护队在特定时间加强巡护，管护能力正在日趋成熟。

连接城市儿童与自然的教育活动

为了更好地保护渠楠白头叶猴保护小区的生态环境，也为了重建城市儿童与自然的联系和情感连接，美境自然采用了在渠楠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的方式，让城市的孩子参与自然教育活动，亲身走进保护小区，了解和接触白头叶猴等喀斯特生物、乡村文化以及保护工作，社区居民也自愿参与到自然教育活动中来。社区的代表多次参加各种培训和考察，提高自己在自然教育和生态农业方面的观念意识和能力。

渠楠从成立社区保护地起就开始进行白头叶猴自然教育基地的建设。2015年1月，保护小区刚批准成立，就接待了第一次冬令营。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16个家庭参加了白头叶猴自然之旅。渠楠的许多村民也都直接参与到自然教育活动中，14户村民为此提供住宿和餐饮，儿童青草社则直接参与自然教育课程，巡护队为自然教育提供安全防护和野外解说，妇女文艺队参与课程中与壮族传统文化和生活相关的活动。2016年在自然教育活动中，村民已经能够参与10%左右的讲解，介绍村庄自然、文化和历史。

截止2017年6月，渠楠的自然教育基地共举办过21次自然教育活动，接待了超过600人次，渠楠通过此活动获得收入19万元，其中大部分为接待户、后勤服务的收入，小部分为村庄提留的社区保护地管理费，主要用于保护地日常的管理以及社区公共事务。如今渠楠白

头叶猴自然体验营和科考营已经成为渠楠自然教育基地很受孩子们欢迎的课程。

开展自然教育后，社区有许多来自大城市的或重要的来访者，这使得全村都对自己的保护地、拥有的白头叶猴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村庄的传统文化等都产生了自豪感，相互之间也更为团结信任。来渠楠参加过自然教育课程的许多亲子家庭都与渠楠保持着日常的联系。

渠楠社区保护地成立后，白头叶猴种群数量明显增长，栖息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在保护小区成立之前，调查确定的白头叶猴种群数量9至10群，85只左右。而在2017年的监测中，发现有猴群15群，数量130只以上。居住地附近的几个猴群都有幼崽出生且都存活下来。以前，白头叶猴栖息地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农林用地的蚕食以及外来人员偷猎盗树等。社区保护地成立后，土地蚕食现象已完全杜绝，外来违法行为也在减少。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效益非常显著，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全村的凝聚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显著提高。

从渠楠社区保护地的成立及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社区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自然资本，而且渠楠社区保护地充分利用了生态和文化资源的优势，让社区内部的各个利益群体都从中受益。这使得渠楠村民都有很高的积极性参与到白头叶猴的日常保护和监督中。如果渠楠未来能够成功地向生态农业转型，将能更好地可持续利用自身的资源走上绿色发展道路，渠楠白头叶猴保护小区也将管理得更好更持久。中

村民用法律捍卫 鹅掌楸的天堂

文 / 叶卫东 摄影 / 杨波、《中国周刊》记者 杨剑坤
支持机构 / 贵州省人类学学会

2015年，天堂界风力发电厂在老寨村山上安装风力发电设施，修路时滚落的碎石，压坏半山的鹅掌楸树林。